

乾隆《萍乡县志》研究*

曾 伟

提 要: 乾隆《萍乡县志》纂修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凡12卷,是清代萍乡第二部县志。纂修者胥绳武既是地方官也是藏书家,致力于方志纂修。在体例方面,受到乾隆时代方志学肇兴和考据之风影响,标明文献来源,注重源流考证。在内容上,增补康熙《萍乡县志》的阙略,扩大文献搜集范围,增加诗文的收录,并在地方名胜的考证,以及风俗考察方面有突出特色。

关键词: 萍乡 胥绳武 地方志

“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地方志作为地方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综合记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萍乡地方志的纂修始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由知县高桂主持(以下简称“正德志”)。随后经万历七年(1579)知县常自新补修(以下简称“常志”),万历十三年知县姚一理续补(以下简称“姚志”),并于万历二十四年经知县陆世勳修纂(以下简称“陆志”)而臻于完善,成“一邑之信史”。遗憾的是这4部明代县志均已亡佚。

萍乡现存最早的方志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知县尚崇年纂修,总裁官是时任江南总督、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称的于成龙,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康熙志之后的一百年间,萍乡没有方志的纂修。乾隆《萍乡县志》(以下简称“乾隆志”)由知县胥绳武主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凡12卷。在此谨对乾隆志的纂修及其体例、特点和史料价值作简要概述。

一 胥绳武与乾隆《萍乡县志》的纂修

胥绳武(1757—1808)字燕亭,别号晋普山房,山西凤台(今晋城)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四十九年任萍乡县知县。^①关于胥绳武纂修县志一事,最早见诸道光《萍乡县志》(以下简称“道光志”),记载如下:“胥绳武,号燕亭,山西凤台拔贡,乾隆时知萍乡。治事果决,修先农坛、建龙神庙,重民事也。新学校、兴书院,崇文教也。纂辑邑乘,搜罗校阅,不遗余力。剗剗甫竣,书未上呈,以诘误去。”^②

从这段记录来看,乾隆志正是在胥绳武离任时纂修完成的。至于胥氏“以诘误去”所因何事,目前可以找到的证据有两条,其一是《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收录乾隆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勒索属员案”中,胥绳武为涉案官员之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主管此案的正是乾隆朝赫赫有名的巨贪和珅。^③另一条证据,根据第一档案馆藏目录显示,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江西巡抚伊星阿奏请将玩视人命之萍乡知县胥绳武革职,此事之缘由始末,笔者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年十二月胥氏在鳌洲书院为即将刊刻的《萍乡县志》写序时,

* 本文得到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图甲制下的乡村基层社会——清代萍乡义祠与义图研究》(项目编号:16LS07)资助。

① 参见曾建开:《清代萍乡知县胥绳武身世及生平事迹考》,《芦溪诗词》(第一期),内部发行,2008年,第244—263页。

② 黄濬修:道光《萍乡县志》卷9《秩官》,道光三年(1823)兴贤堂刻本,第32页。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第四册,第2847—2881页。

已是待罪之身。胥氏上任时年仅 23 岁，年轻有为，勇于任事，在任内“明年修学宫，明年补城，建龙神庙，明年葺书院，各以次竣”^①。此外细致检阅乾隆志，胥氏还有增修县署，重建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楚昭王庙、亨泰桥，重修先农坛，修义冢，整顿濂溪祠，整顿铺递，整顿鳌洲书院等诸多政绩。因事被革的胥氏，离任时方才 28 岁，此时仕途已然黯淡无望，而对于任期内的作为却也无愧于心。《玉壶井铭》是其离任之际内心世界的写照：“五年宦况，一片冰心。知我知我，无如汝深。这般淡味，直到而今。谓我将去，意转淋淋。泉犹如此，人何以任。”^②

玉壶井是县衙内的一口水井，当面对世人的非议、上官的弹劾和灵魂深处的拷问时，罢官而去的他，在井边必定有“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慨叹。至于乾隆志本身，既是考察胥绳武这位地方官政绩的最佳文本，也是其个人事功和政声口碑的注脚。胥氏在编纂乾隆志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在序言中写道：“余念由开馆而来矣，岁俸所支，购古籍几万卷。公退之余，值志稿汇到，检书室中，烧白蜡，啜苦茗，悉心搜研之，征疑信，参异同，毋敢以苟率。完公事，童子傍候良久，方垂头而睡，近听樵楼，漏辄三四下。”

胥绳武本人即为藏书家，南京图书馆藏南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即有他的题跋。^③为了编纂一部质量上乘的县志，胥氏拿出自己的俸禄，购置近万卷古籍以资参考。为了审阅汇编的志稿，胥氏更是连夜进行校读，足见对编修地方志的重视程度和认真态度。乾隆志成书后，“阅泽志者咸称善”^④。值得欣慰的是，萍乡士民并未因胥知县免职，而忘记他的付出和功劳，县志得到完整的刊刻和保存，成全了他任内未竟的事业。

二 乾隆志的体例沿革及特点

方志的修纂，随着时代的变革，内容的增删，体例势必因之变化或调整。通过对历代方志体例的分析，可以感知地方社会变迁历程。对乾隆志体例的分析，应放在明清以来萍乡方志纂修的脉络中进行理解。有明一代的《萍乡县志》虽然无从得见，不过通过阅读留存的序言，可以管窥其体例，略知其源流。正德十三年《萍乡县志》的体例可以从袁州府知府徐琏的序言中管窥一二。

今视所志，若风土、形胜、财赋、吏治、人才、忠节之类，府志所载者尽收之。其所遗略者，考订群书，博采风流，延访士夫、耆老之谈，比事立言，汇次成编，繁不涉于杂离，华不涉于浮诞，就中书载直笔，殆与史法合也。^⑤

正德《萍乡县志》是在辑录府志的基础上，参考若干古籍，并征访士大夫和耆老言论汇编成书，内容涵盖风土、形胜、财赋、吏治、人才、忠节等方面，仅两个多月便修纂完竣。^⑥由于仓促成书，书写草率，失之严谨，至 60 年后的万历时“半成芜陋，典制久湮”^⑦。万历七年知县

① 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首《序》，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② 胥绳武：《玉壶井铭》，乾隆《萍乡县志》卷 12《志文·近作》，第 127 页。

③ 参见江苏省文化厅编：《江苏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上册），凤凰出版社，2010 年。

④ 赵宗耀修、欧阳焘纂：同治《彭泽县志》卷 11《文苑》，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第 56—57 页。

⑤ 徐琏：《萍乡县旧志序》，康熙《萍乡县志》卷 1《序》，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第 1 页。

⑥ 参见徐琏：《萍乡县旧志序》，康熙《萍乡县志》卷 1《序》，第 1 页。

⑦ 简继芳：《续补修萍乡县志前序》，康熙《萍乡县志》卷 1《序》，第 6 页。

常自新补修县志，仅仅是“建设之增易，官秩之代更，才贤之递兴，视旧志其所缀葺而厘正者居多”^①。可以说常志仅在正德志的基础上补充了部分内容。然而，仅仅在旧志基础上的增补，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万历以来的社会变迁，满足官民的现实需求，亟须更新，体例之变即其一端。殆万历十三年（1585）知县姚一理进行续补，“考故实，参评得失，搜罗遗佚，发凡例纲目，续次类编，厘分六卷”，确立了县志的基本体例，兹据姚氏序言整理如下：

表1 万历十三年《萍乡县志》目录

卷次	纲次	目次
卷一	舆图	沿革、星野、祥异、山川、形胜、风俗、方物、赋役
卷二	创设	署宇、学校、城池、祀典、武备
卷三	秩官	政职、教职、属职
卷四	人物	科第、荐辟、贡监、恩荫、掾仕、学道、武勋、隐逸、耆寿、贞节
卷五	方外	仙释、仙女
卷六	艺文	诗、记

姚志凡6卷，纲目体，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志书普遍采用的体例。^②在舆图纲下，将沿革、星野、祥异、山川、形胜、风俗、方物、赋役等条目纳入其中，颇有图经之遗意，旨在强调王朝对地方统治和控制。^③万历二十四年（1596）距姚志纂修仅过去10年后，知县陆世勳又主持了县志的修纂。陆志只是在姚志的基础上进行了史实的考订和内容的增删，并无体例上的变革。^④其中有关“政务之巨细，风俗之隆替，典章之废举”^⑤的内容，无疑是站在地方社会的角度，品评政策的得失和施政的成败，在道义和舆论上对地方官进行劝诫、形成约束，提醒为政者奉行善政与德政。遗憾的是大明王朝的统治在数十年后，就被清王朝所替代。而在地方社会，明清易代的拉锯持续时间更长。就萍乡而言，从崇祯十年（1637）临蓝攻陷县城开始，到康熙十七年（1678）清军攻陷棚民武装的山寨为止，动乱纷争长达40余年。在此期间萍乡也有地方志的编纂，即康熙四年知县台瞻斗纂修的《萍乡县志》，惜已无存，相关内容只能通过康熙九年《袁州府志》略知一二。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藩之乱平定后的第二年，朝廷下令纂修《一统志》，“诏天下府、州、县各以其志来上”，并要求3个月成书。康熙二十二年《萍乡县志》的纂修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并于当年完成编修和刊刻，带有明确的政治任务。^⑥康熙志由知县尚崇年主持编修，该志在综合有明以来诸种县志以及康熙四年县志基础上纂辑而成，以期“参考厘正，务求美善”，

① 简继芳：《续补萍乡县志序》，康熙《萍乡县志》卷1《序》，第3页。

② 参见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文献》1988年第3期。

③ 参见王旭：《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④ 参见陆世勳：《修萍乡县志序》，康熙《萍乡县志》卷1《序》，第9页。

⑤ 陆世勳：《修萍乡县志序》，康熙《萍乡县志》卷1《序》，第9页。

⑥ 参见有关《大清一统志》编修与地方志纂修的关系，可参考巴兆祥：《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乔治忠：《〈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

尤其对康熙五年至二十二年的史事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遗者补之,讹者正之,不当者易之,繁冗者约之”^①。体例如下:

表2 康熙二十二年《萍乡县志》目录

卷次	目 录
卷一	县境图、县城图、县治沿革、分野、疆域、山川、形势、风俗、物产、城池
卷二	署宇、学校、隅乡、坊巷、市镇、津梁、陂塘
卷三	户口、赋税、课程、土贡、里甲、徭役、驿传、坛壝、庙祠、寺观、古迹、丘墓
卷四	官师、官师宦绩
卷五	科第、辟举、贡士、恩荫、援例、理学、武勋、掾考、耆寿、人物列传
卷六	隐逸、懿行、孝行、节烈、游寓、仙释、祥异
卷七	艺文一:记、传
卷八	艺文二:诗、补遗

相较于万历年间姚志6卷的纲目体,康熙志的体量扩充为8卷,条目也有所增加。这些条目中必不可少的就是《一统志》中要求必须有的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等。然后,地方官绅再根据实际搜集的资料进行分类编目,因此在具体编修时,秉持“不拘纲目,贵在直率”的原则。^②此无疑是短时间内成书的必然取向。清代地方志通常有60年一修的不成文惯例,但康熙志成书后100年时间里,萍乡并无方志的编纂,至乾隆四十九年知县胥绳武纂修县志时,已深感康熙志的记载过于简略。^③这种简略多少与战乱初定后,既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和调查,也无法组织专人精心打磨有关。如何在前志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是一件极费工夫之事。胥氏对乾隆志的定位有明确的表述:

我将因仍原刻,缀为后编,分成两概,以补之,是续志也,我则不敢续志。我将全袭原本,各类附入,依样葫芦,以补之,是抄志也,我则不敢抄志。我将彼此互歧,前后交混,治丝而棼,以补之,是芜志也,我则不敢为芜志。我将粗具大概,苟简自安,供人覆瓿,以补之,是略志也,我则不敢略志。我将平平散铺,毫无纪律,如滩头捏沙,以补之,是漏志也,我则不敢为漏志。我将曲徇己私,是非变易,索米酬缣,无所不可,以补之,是秽志也,我则不敢为秽志。何则?我之心良苦矣,我之力则良难矣。^④

在乾隆盛世背景下方志纂修,自然要有盛世气象。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不惜人力物力,长时间精细打磨。胥氏对乾隆志的定位是“以功勤补前志”。功勤,即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纂修县

① 尚崇年修、谭铨等纂:康熙《萍乡县志》卷1《凡例》,第1—3页。

② 参见尚崇年修、谭铨等纂:康熙《萍乡县志》卷1《凡例》,第1页。

③ 参见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1《志说》,第1页。

④ 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1《志说》,第4页。

志。为此胥氏拿出自己俸禄，购置近万卷古籍作为修志资料参考。乾隆志，对于资料来源，无不注明出处。仅以“物产”条的编纂为例，胥氏要求所有物产要“博考群书，分疏详确”，征引书籍就多达上百种，若非胥氏倾囊购书，仅以蕞尔小县的县学藏书断然无法支撑如此精细的县志编修。乾隆志凡12卷，具体如表3：

表3 乾隆《萍乡县志》目录

卷 目 数 录	总目	详目
卷一	志天	稽象（星野）、稽时（气候、祥异）
卷二	志地	辨方（沿革、疆域、都鄙）、辨境（山水、形胜）、辨土（物产、风俗）
卷三	志制	建治（城垣、官署、公所）、建祀（坛壝、庙祠）、建工（铺递、陂塘、津梁）
卷四	志赋	足民（户口、田粮、积贮）、足军（屯法）
卷五	志教	隶城（学宫、学署）、隶乡（书院、膳产）
卷六	志兵	示备（营务、关隘、操场）、示戒（武事）
卷七	志官	称职（县秩、学秩、武秩）、称政（循吏）
卷八	志名	纪遇（进士、举人、武举、诸贡、辟荐、例选、掾考）、纪恩（封赠、乡宾、耆寿）
卷九	志贤	叙学（儒林、文苑）、叙品（方正、孝友、善行、隐逸）、叙功（游宦、武略、尚义）、叙节（寿母、孀妇、烈妇、孝妇、贞女）
卷十	志外	记游（侨寓）、记居（仙释、寺观）
卷十一	志古	集迹（胜迹、遗迹）、集墓（旧墓、宦墓）
卷十二	志文	甲编（前作）、乙编（近作）

相较于康熙志，乾隆表大部分的条目得到保留，部分条目变更了名称。如康熙志的“官师宦绩”在乾隆志更换为“循吏”。也有部分条目进行了删减，赋役这块尤其明显，如康熙志中户口、赋税、课程、土贡、里甲、徭役等项目减化为户口、田粮，说明摊丁入亩的政策得以实施。还有部分新增条目，如积贮、膳产等，说明地方的慈善、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寿母条目的设置，反映盛世之下百姓人寿年丰，百岁高寿之人列入方志，更是盛世的见证。从编排的方式来看采取的是纲中有纲，目中有目形式，条目更为细致。对于为何要进行如此的分类，县志的凡例也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了回应。

问志体，纲中纲，目中目，不似赘疣乎？曰：中作一纽。以纲言，则纲之大目也；以目言，则目之小纲也。总类中分类，分类中又分类。

问志体之式。曰：通体纲目之分，如枝枝相对，叶叶相当。^①

这样的分类是否妥当，或可讨论。而凡例行文篇幅之长，也说明乾隆志的体例较康熙志进行了全面创新。最大的变化就是各条目有引言和散文，“引言以分纲目，散文以别条类”。而各卷有一段汇考的文字，方便读者对各纲目的制度源流和背景有所了解。

问汇考之法。曰：史者一代典故，志则古今原委也。志家之法，莫先于考核原委，他志附考，有冗者，有略者，有散者，今志必该括成文，总著于各志之端。

问汇考之法，得毋玉卮无当乎？曰：志家泛填通行事宜，则他志都可作一志张本，志家考核古今原委，则一志并可作他志证据。

问汇考之法，博求诸书，可以獭祭鱼否？曰：以诸书广己见，要以己见汇诸书。^②

通读汇考的原则，可以看出乾隆志考究事物本源的努力，而地方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反映古今原委。汇考的写作离不开开阔的视野和广泛的文献阅读，谨选取卷11的汇考为例：

堪輿之说，周时已有之，惟用以建都邑。而卜葬则始于秦樗里，汉时尚不甚重。晋郭璞以其术显，相沿至今，则惑世之甚者也。语云：阴地不如心地。萍之人慎毋笃信风水，生贪启争，致为青鸟家误。^③

此段论述虽简，必定是参阅大量文献后感而发。显然汇考的目的在考辨源流，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此处对堪輿源流的追溯，意在劝诫人们不要迷信风水，为之所误。乾隆时代的考据之风也影响着这部方志，对地方史焦点问题的考证，尤为重视。如杨岐山之得名是否与杨朱有关。经过考证认为，杨岐山是因“昔有杨姓居之故名”。萍乡又称楚萍或昭萍，乃因楚昭王渡江得萍实而得名，此事原载《孔子家语》，可信度受到质疑，胥绳武为此做了一番考证：“余尝考昭王事，疑之者三，解之者三。王走郢奔随，《史记》无至萍事，一疑；萍不近江，萍实何由获？二疑；山巅无水，兵何由屯？三疑。萍实事见《家语》，《史记》可信，《家语》独不可信乎？一解；因渡江获萍实，非必大江也，二解；屯兵楚山，非必在巅也，后人乃庙祀于巅耳，三解。”^④

胥氏的“三解”是对地方史争议问题的个人回应，他认为楚昭王渡江得萍实是可信的，而昭王来萍也并非不可能。邑人甚至认为楚昭王渡江之地，即县北邻近醴陵的香水渡。而关于香水渡的归属地问题，邻县醴陵甚至还提出过争议，所以才会有归属权的争夺，萍乡方面通过多方考证作出了回应，并将其载入县志中。^⑤说明在知名景点归属地的争议上，考证的方法发挥了现实作用。当然乾隆志并非无可指摘，在追求考证源流与汇通的同时，对于文献剪裁汇编，并不利于历史文献的完整保存。为此嘉庆《萍乡县志》就批评乾隆志的艺术部分“多所改

① 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1《志例》，第1页。

② 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1《志例》，第2页。

③ 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11《汇考》，第2页。

④ 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12《志文·近作》，第105页。

⑤ 参见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12《近作》，第118页。

易”，责其“强古人之作以就我意，殊非记言者所宜”^①。然而即便如此，乾隆志的史料价值仍不可忽视。

三 乾隆志史料价值

地方志作为地方社会文化的综合记载，其资料的来源是多元的。最集中者莫过于对县志、府志和通志等旧志资料的沿袭，其价值体现在旧志亡佚的情况下，具有辑佚的作用。其次，是对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经典文献的引用，毋庸深辨。再次是正史、典章、律令等制度性文献，通常也不难获见。最后是文人文集，集中于艺文志部分，在保存地方文人的诗文方面价值巨大。由于地方文人知名度不高，通常没有文集刊刻，即使刊印文集存世量少且较易亡佚，方志是收录其诗文的主要载体。如胥绳武本人现存的诗文，就集中登载于乾隆志中。

乾隆志相较于前志，征引的资料均有出处，有清晰的资料来源，能够比较容易把握核心史料所在。乾隆志最有价值的史料包括两部分，其一是补康熙至乾隆百年间缺失的史实；其二是记录乾隆末年史事。这些资料的来源，既包括官府档案，也有来自文人文集和征访调查的资料。采编自官府档案部分的内容，集中在赋役、户口和军事部分。如赋役册籍这类官方档案就有五种：“凡赋役志籍五，有登丁者，有登粮者，有兼登丁粮者。四柱黄册，洪武十四年刊。鱼鳞图册，二十年刊。赋役总会文册，嘉靖二十八年刊。赋役纪，四十年刊。重定税粮科则，万历十四年刊。”^②

这些赋役册籍大多刊行于明代，至清代依旧是征纳赋税的参考。至于征访的材料，往往是通过由上而下的访查和由下而上的上报而得，通过凡例的考察可以得知：“问陂塘太多。曰：详水利也。据所报者载之。问津梁载法。曰：桥、渡以考前志为主，余则据所报者载之。”^③

“据所报者载之”应是为修志而上报的资料。当然，除了上报资料，调查访问资料也有，比如关于萍乡民众年度活动安排的记录，必定是通过实地采访得悉，兹整理如下表：

表4 萍乡民众年度活动安排表

月 份	渔民	官吏	山民	女子	农民	乡人
正月	蓄鸬鹚	迎春			占年、修田器、薅草、敷苗	跳傩、驱疫病
二月		春祭东西二坛	种竹生笋、植树		分秧、植蕨、早稻播种	
三月		劝农于郊、祭先农、行耕藉礼	闽广人耕山种茶	采桑饲蚕		

① 参见张彭龄修、刘凤浩等纂：嘉庆《萍乡县志》卷首《志例》，第2页。

② 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4《田粮》，第10页。

③ 胥绳武修、欧阳鹤鸣纂：乾隆《萍乡县志》卷1《志例》，第8页。

(续表)

月 份 身 份	渔民	官吏	山民	女子	农民	乡人
四月		行雩礼	入山伐煤	纺绩	耘田、种芸苔、 割蜜、修堤	
五月			山乡涸田 种粟		始蒔丫禾	作优剧、游城 隍神于市
六月			种脂麻、 是月花开、 种烟	曝衣	曝谷、蒔早稻	
七月			菌菰出、 取漆		中稻收获	
八月	水未涸	秋祭东西 二坛	种薯		隙地种大豆、 晚稻熟、采茭 笋、种麦	
九月	萍水渐涸 舟楫不行		伐木为炭、 栗树熟、 掘姜		二禾登、藏良 种、备杂蔬	
十月					收荞麦、修桥 梁、平道路、 酿冬酒	
十一月			收柏树子		葺墙屋、治园 篱、生煤炉、 造农具	
十二月					启塘泥、刈茅 草、待春耕	

这份关于民众日常活动的记录表，详细记录了一年中每月活动安排，是社会经济史难得的资料。而这些资料能够保存于县志的原因，更在于胥绳武本人对萍乡地方文化有强烈的兴趣，并且热情地投入和用心地搜集整理。胥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9首关于萍乡的竹枝词：“竹枝，巴俞也。刘梦得得居建平作新词，仿屈子《九歌》意，颺之讴声。厥后，吴依楚些，迭谱成词，多袭竹枝之名，不必巴郡也。余宰萍以来，日与民亲，其地、其时、其人皆所稔历，征诸土俗，

间以方言，以成竹枝九首，谓借为咨访也可，即谓代为歌谣也可。”^①

竹枝词由民歌转化而来，好的竹枝词作品，作者必定对地方风俗和掌故极为熟悉，方能让人读来产生共鸣。而胥绳武任职期间“日与民亲”，对于土俗也日渐熟悉并与民同乐，一位随和而“接地气”的地方官员形象也跃然纸上。9首竹枝词，可谓清中叶萍乡社会经济的写照，几乎每首都能找到可以挖掘的社会历史信息，有的学者正是通过解读这批竹枝词，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②笔者也曾就其中的部分作品进行了初步的解读，仅举两篇为例：“村妇肩挑石炭还，蓬头赤脚汗颜斑。道旁一让行人俏，不采山花插鬓间。（芦溪道中闽广妇人多往来挑炭）”这首竹枝词在萍乡煤矿史中广泛引用。通过“赤脚”“汗颜”“山花”等信息可以推测煤炭运输的黄金时间当为春夏之交。因为春夏之际河流水涨，运煤船可以顺水进入下游的湖广地区进行销售。然而，春夏之际又正值农忙时节，劳动力十分紧缺，最终挑运煤炭的任务落在了吃苦耐劳的闽广移民女子肩上。另一首：“比半铜钱赴太街，街南小店正新开。不须细数零星货，贩得衡州烟酒来。（钱以七十九文为一比，四十文为半比）”烟酒是衡阳重要的物产，价格便宜味道好。这段史料说明乾隆年间，来自衡阳的烟酒已经在萍乡拥有很好的口碑，是市场上最抢手和最受欢迎的商品。笔者对胥绳武竹枝词的解读，还只限于读书札记层面，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内涵，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杨际熙的《社仓引》也是珍贵的社会经济史资料：“农夫八口之家，耕不过二三人，田不过十数亩，收不过数十石。完官租、应公役，又私自戚里往来，庆吊相仍，其所赢无几。一家男女长幼，衣食嫁娶，皆出其中。其俭者，析薪数米，尚足以自给。其稍耗者，左支右绌，已不免剜肉医疮之患。岁一值水旱，家口嗷嗷，操券以贷，出倍称之息。或仰求无门，于是有卖田宅、鬻耕牛，以度浸岁者矣。”^③

这条资料在章有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也有收录，反映的就是清乾隆年间以来人多地少，农民生计艰辛，家庭剩余人口为了谋求生存，必须寻求农业之外的生计维持生活的现状。此外乾隆志中还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不再赘述。

结 语

乾隆《萍乡县志》其受乾隆时代考据之风影响，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强调资料的来源。对地方名物，则注重源流考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主纂官员在方志方面的素养以及对资料搜集的重视，保证了该志的质量。同时该志在旧志基础上，进行体例创新，扩大文献搜集范围，增加诗文收录，在地方名胜考证以及风俗考察方面有突出和鲜明的特色，对于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的考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胥绳武：《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言》，乾隆《萍乡县志》卷12《志文·近作》，第147页。

② 代表性的成果如凌焰：《清代城市图甲组织研究——基于萍乡县五隅公所案的考察》，《历史地理》，2015年第2期；龙成前：《从胥绳武竹枝词看清代风俗民情》，《城市建设与研究》，2011年12月第35期（总第121期），第286—288页；曾建开：《清代萍乡知县胥绳武身世及生平事迹考》，《芦溪诗词》（第一期），2008年，第244—263页；王振忠在讨论“五隅”组织的时候，亦引用过胥绳武的竹枝词，参见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③ 杨际熙：《社仓引》，乾隆：《萍乡县志》卷12《志文·近作》，第106页。